

隋書經籍志研究

○杜雲虹 著

文物出版社

隋書經籍志研究

杜雲虹 著

 文物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書經籍志研究 / 杜雲虹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7

ISBN 978 - 7 - 5010 - 4614 - 0

I. ①隋… II. ①杜… III. 古籍 - 圖書目錄 - 研究 - 中國 - 隋代
IV. ①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29889 號

隋書經籍志研究

著 者：杜雲虹

責任編輯：許海意

封面設計：程星濤

責任印製：張道奇

出版發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 2 號樓

郵 編：100007

網 址：<http://www.wenwu.com>

郵 箱：web@wenwu.com

經 銷：新華書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環印刷廠

開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張：24.25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 - 7 - 5010 - 4614 - 0

定 價：68.00 圓

本書版權獨家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複製翻印

志第二十七

隋書三十
二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莊國公臣長孫无忌等奉勅撰

經籍一
經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百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
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何殖焉不與者
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
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爲人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亦靜
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
文選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
教有適其用無窮寔是仁義之心鉤誠道德之橐籥而其爲用奚
廣時之義深矣信無得而確局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
傳後之所以口入耳聞一朝一夕以大道方行脩範象而設

齊揚州都督監修國子程國公長孫無忌奉勅撰

經籍一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太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耳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繫靜指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

元大德饒州路儒學刻明正德嘉靖遞修本《隋書·經籍志》首頁

序　言

初見杜雲虹，是2006年秋查找梁啟超的資料，她在山東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任主任。次年，雲虹報考山大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從我與王君承略教授學習。我對她提出幾點要求：一是做文獻研究要能耐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肯下死功夫；二是學位論文要及早入手，三年時間轉眼即逝，加之在職學習，用於學業的時間更短，稍有鬆懈，恐難按時完成學業；三是結合自身思維特點和工作性質，選擇適合自己的論文題目。

2008年11月，我參與第一批《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初審，與山東中醫藥大學的郭君雙女士及雲虹同在一組，評審子部古籍。評審中獲知，珍貴古籍名錄的評審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一項重要內容，國家層面由國家圖書館具體負責，省級層面由各省級公共圖書館負責，山東就由山東省圖書館作為山東省古籍保護中心，承擔全省古籍保護工作的部署與實施，具體工作由歷史文獻部承擔。雲虹作為部門主任，帶領下屬既要對全省古籍保護工作進行統籌規劃，又要進行本館的古籍普查與保護等工作。雲虹和同事們用兩個月，從全省81家單位申報珍貴名錄的10358部古籍中，篩選出7513部古籍提交專家委員會進行初審。初審名單是一個電子表格，除了書名卷數、著者、版本、行款、收藏單位等必備項目外，備注項內容豐富：既有對該書的相關考證，如各家目錄著錄情況、著者及版本源流等，又有對該書學術價值、文獻價值的評定；對於考辨不清有疑問的書籍，則注明疑惑之處，提請專家決斷。在對提交的子部古籍逐條評審時，雲虹對評審數據非常熟悉，幾乎每一條數據都能說出子丑寅卯；對有疑問的古籍，不僅指出疑問所在，還能提出自己的見解。經過這三天高強度的評審工作，我對雲虹有了新的認識：不僅熟悉業務，而且工作思路清晰，思維邏輯性強。

評審工作間隙，雲虹與我討論她學位論文的相關問題。當時的選題是《史志目錄研究》，與她的工作密切相關，祇是考慮她工作繁忙三年難以完成，

遂向她建議選擇其中某部史志目錄作專題研究。後來她定題目為《〈隋書·經籍志〉研究》。

2012年3月，雲虹提交論文初稿，洋洋五十餘萬字，從目錄學和學術史兩個視野對《隋志》進行研究，頗有獨特見解。《隋書·經籍志》作為第二部史志目錄，在目錄學與學術史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目錄學角度看，它繼承了《漢書·藝文志》的編纂體例，又吸收漢魏以來目錄學的優良成果，確立了四部分類法，使之成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主流分類法；從學術史角度看，它採取現實藏書與見存書目相結合的方法，梳理唐以前典籍的傳播與散佚，為後人研究學術源流及演變、進行古籍整理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據。因此，歷代研究者衆多。有從目錄學角度研究的，如王重民、王辟畧、余嘉錫、姚名達、許世瑛、來新夏等人，多將《隋志》作為其目錄學著作的一個章節，討論《隋志》的著者、分類、編纂體例等問題。有從考據學角度研究的，如劉知幾、鄭樵、焦竑、朱彝尊、王鳴盛、錢大昕、紀昀、章宗源、張鵬一、姚振宗等人，或對《隋志》分類、體例、小注以及所著錄書籍的錯謬等進行評述與考辨，或增補《隋志》遺漏之書。有從學術考辨角度研究的，如徐有富、逯耀東，前者分經史子集對各自領域內的學術發展的問題點進行敘述，如經部討論了“今文經學走向衰落”、“禮學特別受到重視”、“《春秋左氏傳》超過《春秋公羊傳》”、“進一步強調孝道”等問題；後者從史學的高度，在分析魏晉史學思想和社會背景的基礎上對《隋志》史部的確立進行論述，特別分析了《隋志》史部與劉知幾《史通》分類的不同，以及雜傳類的分類。

這些研究多為專著中的一兩個章節，故略顯粗略，從目錄本體研究角度看，對《隋志》的目錄學特質研究不夠深入，對其分類體系研究甚多，而鮮有論及其著錄項目、款目組織原則等；從學術考辨研究角度看，關乎《隋志》在學術思想、學科演變以及目錄學史方面的總結性研究，還嫌泛略而不細緻。

雲虹的研究，從目錄學和學術史兩個方面進行。目錄學方面，除探究《隋志》作為史志目錄所具備的特質外，還討論了《隋志》版本目錄、知見目錄的特性及價值；除探究《隋志》分類體系外，還着重分析了《隋志》著錄項目與編纂體例。學術史方面，通過對《漢志》與《隋志》類序、著錄書籍的研究與梳理，總結出《隋志》體現的學術思想、唐以前各學科的發展與演變。這次對《隋志》的系統梳理與研究，有理有據，可稱填補空白之作。

當然，雲虹的《隋書經籍志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如對《隋書·經籍

志》研究歷史的探討尚不夠深入，祇在前言中進行簡略地梳理，未能深入評判各家特點、價值等。望雲虹在工作之餘能在此一方面再加探討。

雲虹畢業轉瞬四年，期間曾多次催促她將論文修改出版。今聞將付梓，略寫此以勵其在修遠學路不倦探索！

鄭傑文

2016年2月3日於濟南

《隋書經籍志研究》序

中國古典目錄學，是以書目為表現形式、以學術發展史為研究內容的一門學問。由此認識可見，古典書目的核心要素，一是著錄體例方面的表現形式，一是學術源流方面的根本內容。學術內容通過高質量的著錄體例而體現，著錄體例以充分反映學術內容為最高要求。一部成功的書目，二者相輔相成，融為一體，不留痕迹。對著錄體例的研究，就是對書目編制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對學術源流的研究，就是對書目本質內容的研究。要想對一部書目進行全面透徹的研究，這兩個角度是缺一不可的。

中國的古典書目，分為官修目錄、私家目錄、史志目錄三類，總數在2000種以上。在數量衆多的古典書目中，有4部值得大書特書。一是《漢書·藝文志》，二是《隋書·經籍志》，三是《文獻通考·經籍考》，四是《四庫全書總目》。這四部書目要特別重視的原因，首先在於它們目錄體例的完善與學術內容的豐富，其次在於它們成書的特定時代以及書目的集成性質。

《漢書·藝文志》開創了史志目錄的編纂體例，反映了先秦與西漢的學術史，是研究上古學術文獻的首要之書。《隋書·經籍志》確定了四部分類體系，重點反映了漢代以來特別是南北朝時期典籍的流傳情況與學術發展源流，是研究中古學術文獻的必讀之書。《文獻通考·經籍考》首次使用成熟的輯錄體，全面反映唐宋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是研究中國封建時代全盛時期學術文獻的必備之書。《四庫全書總目》體例最為精善，內容最為豐富，是中國封建時代目錄學的巔峰之作，全面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特別是宋代以來的學術文化面貌，是讀書治學的案頭常備之書。四部書目體例的完整與創新性，學術內容的豐富與集成性，成書時代與收錄範圍前後銜接的系統性，使得它們成為古典書目的翹楚，成為古典目錄學的研究核心。

從四部書目的構成看，三種為史志目錄，一種為官修目錄。史志目錄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二十五史中，有7種原有藝文志或經籍志，經過清代、

民國和當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另外 19 史也都補上了藝文志或經籍志，《後漢書》《晉書》《金史》等史書甚至有 5 種以上的補志。所以，與官修目錄、私家目錄相比，史志目錄更具系統性和完整性。這也正是史志目錄的價值所在。將二十五史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及其考補之作匯為一編，就是中國古代典籍總目。中國古代到底撰寫了多少種著作，這些著作到底反映了怎樣的學術面貌，就可以得出比較準確的回答。有鑑於此，我自 1987 年師從王紹曾先生學習目錄學開始，就對史志目錄特別關注。1989 年我撰寫的碩士學位論文，以《清季目錄學家姚振宗》為題，而姚振宗是迄今為止史志目錄研究的第一大家，研究姚振宗，就是研究史志目錄。值得欣慰的是，自 2005 年開始，我與劉心明先生攜弟子數十人，編纂完成了《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一書，收書 84 種，分為 27 卷，凡 31 冊，960 萬字，標點校勘出版，實現了衆多前輩學者的心願，也實現了我的夙願。

2007 年至 2012 年，雲虹女士攻讀山東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此間正值《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編纂並陸續出版。雲虹供職於山東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出於工作的需要和她自己的興趣，也為了與《萃編》的編纂出版相呼應，我倆商議，以《史志目錄研究》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利用現成的資料，做史志目錄綜合性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時值古籍普查如火如荼，雲虹工作十分忙碌，白天上班，周末加班，祇能利用晚上的時間進行研究。如此一年有餘，雲虹有感於研究內容過於龐大，而時間緊迫，遂將研究做了調整，專攻《隋書·經籍志》。之所以選中《隋志》，是因為在四部重要書目中，《漢志》《總目》關注有餘，而《隋志》《經籍考》研究不足。在《隋志》《經籍考》兩者當中，《隋志》尤當優先考慮。主意已決，雲虹全力以赴，一鼓作氣，完成《隋書經籍志研究》，煌煌巨制，上下兩編，上編是《隋志》的體例與學術研究，下編是《隋志》考據性質的校讀，合則雙璧，分則單行，成為姚振宗之後，研究《隋志》最用功、最有成績者，我們不禁為她深感高興，也為古典目錄學研究的新突破感到慶幸。

與一般史志目錄或記一代藏書之盛、或記一代著述之盛不同，《隋志》在成書性質上甚為獨特。《隋志》反映漢代以後特別是南北朝時期典籍撰著與流傳情況，是知見性質的數代文獻總錄。《隋志》變前代“藝文”為“經籍”，認為“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

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將經籍的作用抬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然而，南朝北朝，政權更迭頻仍，大亂 160 餘年，典籍亡佚嚴重，大大消減了經籍的無上功用，對統一伊始的統治者來說，是無比心痛並要想方設法補救的事情。《隋志》刻意保存西晉以下大量圖書流傳資訊，體現了登記在冊、依目訪書的用意。將《隋志》與《漢志》相較，我們不能不震驚於典籍喪亡之慘烈；將《隋志》與新舊《唐志》相較，我們又不禁為典籍失而復得而欣喜。期間典籍流傳情況之複雜，出乎我們的想像，正是因為有《隋志》的著錄而見其大概。為此，我們不能不佩服《隋志》的作者，雖然他還欠缺一點書目編纂的專門之學，但他的典籍會通觀、學術宏通觀，決不在劉歆、鄭樵之下。而唐代初年，儒學隨着《五經正義》的纂修而重振，道學因玄學的流行、道教的改良成熟、煉丹術的興起而普及和世俗化，佛教走向了中國化改造的歷程，三教並行不悖和漸趨融合預示了一個思想創造高峰的即將到來。加以三百年來史學、文學的空前繁榮，子學的演化與整合，中國的學術畛域也隨着四部分類法的確立而相對固化和穩定。凡此種種，無論是《隋志》所體現出的目錄學的理論與方法，還是《隋志》所體現出的學術思想內容，雲虹都在書中作出了較好的探索與回答。至於下編《隋志》校讀部分，我已納入《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續編》中，估計不久的將來，亦能與讀者見面。我們期待，雲虹以此為起點，把史志目錄的研究更加深化並加以拓展，不斷推出新成果。

王承略
2016 年春節前二日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隋志》性質	8
第一節 《隋志》是敕修合撰的史志目錄	9
第二節 《隋志》兼具版本目錄性質	19
第三節 《隋志》既是藏書目錄，又是知見目錄	37
第二章 《隋志》的編纂體例	39
第一節 著錄項目	42
第二節 編纂體例	88
第三章 《隋志》的目錄學價值	94
第一節 促進目錄學成為獨立的學科	94
第二節 確立四部分類法，使之成為古典目錄之永制	97
第三節 輯錄典籍流傳情況，為後世古籍整理提供重要線索	131
第四章 《隋志》總序與大序中體現的學術思想	153
第一節 哲學思想	153
第二節 尚古思想	155
第三節 文獻學史思想	164
第四節 史學思想	168
第五節 子學思想	172
第六節 文學思想	175

第五章 從《漢志》《隋志》各類小序及著錄書籍看唐以前學術史的發展	181
第一節 經學的發展	181
第二節 史學的發展	222
第三節 子部各學科的發展	248
第四節 文學的發展	327
參考書目	359
後 記	374

前　言

《隋書·經籍志》（下簡稱《隋志》）是繼《漢書·藝文志》（下簡稱《漢志》）後的第二部史志目錄，也是我國現存的第二部較為系統的綜合性圖書分類目錄。它繼承了《漢志》創立的史志目錄的編纂體例，同時又吸取漢魏以來目錄學的優良成果，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使之成為後世目錄的主流分類法；創立了“合其近密”的目錄編制方法，總結並評價了前代目錄學的發展，在我國目錄學發展史上，起着承前啓後、推陳出新的重大作用。它採取現實藏書與見存書目相結合的方法，對唐以前典籍傳播與散佚進行梳理，既著錄了隋代現實藏書，又著錄了大量的亡佚之書，為後人研究學術源流及演變、進行古籍整理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隋志》自成書以來，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對《隋志》的研究絡繹不絕。唐劉知幾《史通·書志》、宋鄭樵《通志·校讎略》、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糾謬》、清朱彝尊《經義考》、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清錢大昕《隋書考異》及《十駕齋養新錄》、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諸書對《隋志》的分類、體例、小注以及所著錄書籍的書名、卷數、著者、時代、序次、重複、遺漏的錯謬等皆有諸多評述。

清乾嘉以後，出現對《隋志》進行增補、考訂的專著，如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雖然只對《隋志》史部著錄的書籍進行考證，却是第一部對《隋志》進行系統考證的專著。

該書基本按照《隋志》史部著錄次序，^① 對其所著錄書籍進行考證，內容涉及著者、卷數、後世引用、各書目著錄異同、輯本、糾謬等方面。對

^① 唯將地理、譜系、簿錄三類移至舊事類之前，其類內著錄書籍次序尚依《隋志》。李慶《關於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的三個問題》一文認為，此乃章氏手稿流傳或刊印時次序錯亂所致，並有詳細考證，其說可信。其文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6期。

《隋志》所著亡書一併予以考證，並注明“梁有隋亡”；對清代尚存之書，注明“今存”。又補入《隋志》不著錄的書籍約780部，除注明“不著錄”外，詳考其出處。

姚振宗認為：“（章氏）蓋極意規仿王氏《漢書·藝文志》，其於著錄之書不求甚備，而篇叙之文反有所考；於撰人始末不必甚悉，而傳注類書所引諸佚文則獨致其詳，皆王氏書之例。而所謂‘不著錄’者，亦王氏之例。”^①姚氏評價頗為公允。

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是《隋志》補遺之作，他依據《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北史》等史傳所載補入《隋志》未著錄的書籍，計279部、30篇，多為北朝人、隋人著作，對全面瞭解唐以前學術發展是有益的補充。

該書沿用了《隋志》的四部分類體系，對所補之書各依其類分別著錄書名、著者、所據出處，對部分書籍的內容、學術源流有所考辨。與《隋志》不同的是，對著者的著錄略去其官銜、身份，而代之以著者籍貫，這種做法為後人研究地方文獻提供了線索。

對《隋志》考證最為有力者當屬姚振宗，其對《隋志》的考證可謂巔峰之作，迄今無人逾越。

姚振宗旁徵博引，對《隋志》所錄書籍的作者、書名、篇卷、大旨、緣由、得失、時代、學術淵源、存佚、版本、輯本、真偽、相關著作等一一進行考辨，對《隋志》的著者、編撰依據、體例、分類等皆有論述。除此之外，姚氏在考辨《隋志》之餘，還對其所引用材料進行考辨，如考辨其他書目不載的原因、著錄錯誤、對比兩書引文異同、對他人考證提出異議、對引用材料進行糾謬、指出前人輯佚之誤與遺漏等等。覽之，不由深感其博大精深，令人歎為觀止。^②

姚振宗基本上還是立足於目錄學對《隋志》進行考辨，重視對目錄本體的研究。

姚氏以後，鮮有從考據學角度對《隋志》進行研究者。唯當代日本学者

^① [清]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卷首敘錄·敘章氏考證》，《二十五史補編》本，中華書局，1955年，第5049頁。

^② 關於姚氏《考證》，臺灣淡江大學陳仕華教授撰有博士論文《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研究》，對該書義例、取材及姚氏對《隋志》撰者、來源、體例、分類的論述等問題，都做了系統梳理和翔實論證。

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沿襲姚氏之路，對《隋志》進行詳考。惜其書為日文寫成，尚未有中文版，只能粗略讀之，僅有皮毛之見。

目前，對《詳考》的認識大多依據葛兆光教授撰寫的《評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一文，該文對《詳考》的內容進行介紹。

《詳考》大體由三部分構成，首先是對總序與各類小序的翻譯，其次是對序文與小序的注釋，再次是對所登錄的書目、作者及小注的補注。全書近一千頁，卷首是興膳宏教授的“解說”，對中國書籍演變的歷史、目錄學史以及《隋志》的形成、內容與影響作了詳細的闡述，卷末是以五十音序排列的《書名索引》和《人名索引》。^①

該文對《詳考》如是評價：

不是像章宗源、姚振宗那樣把重心放在發掘同時的史料，以考證這些書籍與作者——儘管在本書中這種考證也不少——它主要做的是，第一，將《隋志》著錄與《日本國見在書目》對照，以反映漢隋之間的學術文化在日本的影響。第二，將《隋志》之後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玉海》《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以及《四庫全書總目》等對本書的著錄，一一附注於下，以考見漢隋學術文化在後世的流傳。第三，附以“輯本”一目，將已經散失的書在後世的輯逸（佚）情況向讀者交待，據其《凡例》，他們參考的輯本包括了《玉函山房輯逸（佚）書》正、續、補編，《經籍佚文》《漢學堂叢書》《漢魏遺書抄》等十餘種大型中國輯逸（佚）資料外，還包括了日本的《本幫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及び同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6）和《重修緯書集成》（明德出版社，1971）。^②

葛教授對《詳考》的這段評價，反映了該書在日本《隋志》研究方面的地位與成就。但他大概並未曾仔細研讀過姚振宗的《考證》，現就他所言，將姚氏《考證》與興膳宏《詳考》作一比較。

^① 葛兆光：《評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載《域外中國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5頁。

^② 同上書，第37~38頁。

第一，就引用書目而言，據陳世華教授所列姚氏《考證》的《引用資料之目錄》統計，姚氏《考證》引用書目多達269部，遠遠多於《詳考》中所列的目錄13部、輯本18部，合計31部。其資料翔實，考辨廣博，不言而喻。

第二，就與《日本國見在書目》比較而言，姚氏《考證》在214部書籍下著出《日本國見在書目》的著錄，另在57部書籍的考辨中與《日本國見在書目》對比，或指出其錯誤，或指出其著錄的同類之書，或比較二者不同著錄，或比較傳本異同等等，不一而足。可見，將“《隋志》著錄與《日本國見在書目》對照，以反映漢隋之間的學術文化在日本的影響”，並非肇始於《詳考》。

第三，就後世書目對書籍的著錄而言，姚氏《考證》除著出《詳考》所列各書目著錄之外，還有《四庫未收書目》《崇文總目》《世善堂書目》《孫氏平津館鑒藏記》《孫氏祠堂書目》《孔氏著述考》《闕里文獻考》《四庫簡明目錄》《經義考補正》《小學考》《四錄堂類集目錄》《書目答問》《經籍訪古志》等等。^①

第四，就“輯本”一目而言，《詳考》列輯本目錄18部，姚氏《考證》所涉及輯本，除《經籍佚文》《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和日本輯本外，其餘皆有涉及。另有張澍《二酉堂叢書》《段氏沙洲記輯本》、茆泮林《十種古逸書》、黎庶昌《古逸叢書》等，為《詳考》所不具。

另外，姚氏《考證》還將《隋志》與《漢志》《漢書藝文志考證》《後漢藝文志》《補後漢藝文志》《補三國藝文志》《補晉藝文志》等書目對比，考辨自漢至隋書籍演變流傳，這是《詳考》所不具的。

另有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對《漢志》《隋志》《四庫全書總目》的總序、大序、小序進行注釋，並從目錄學角度對其評價。評價主要集中在類目設置是否恰當、著錄書籍與類目是否匹配等方面。

近現代以來，從目錄學角度研究《隋志》的著作頗多，其中較為著名的如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王辟畧《目錄學研究》，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許世瑛《中國目錄學史》，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篇》等等，大都將《隋志》作為其中一個章節，討論其著者、分類、體例等問題。

從學術史角度研究《隋志》的著作較少，所見有徐有富《目錄學與學術

^① 引自臺灣陳仕華教授《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研究》中《引用資料之目錄》。